

文学译介选材与中国女性形象构建

——以 1979 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之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为例

付文慧

摘要：本文聚焦 1979 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所推出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的选材问题，从形象学视角探讨中国文学出版社通过选材所构建的中国女性形象与西方固有刻板印象相比有何进步；从性别研究视角探讨其实际构建和试图构建的中国理想女性形象之间有何悖论，以彰显其贡献和不足，为未来中国的对外译介行为提供借鉴。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贡献在于：其本着民族本位意识，力图展现中国新时期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尤其侧重呈现城市普通女性形象，有助于弥补英语世界对中国女性片面化、类型化塑造的缺陷；不足之处在于：其对中国理想女性的形象构建呈现双重标准：部分入选作品力图呈现获得解放、走向社会、独立自主的积极正面的中国女性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则在赞扬或神化的外衣下无意中宣扬了符合男权价值标准和审美观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中国文学出版社；英译合集；选材；女作家；中国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 H059

DOI: 10.12002/j.bisu.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9) 06-0068-15

引言

本文聚焦 1979 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所推出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的选材问题。研究选取 1979 年作为时间起点，原因有二：一，从社会政治角度而言，1979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和中美建交之年，自此开始，中国打开国门，中英世界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二，从文学译介活动本身来看，1979 年出现了最早的两部新时期文学英文译著，分别为香港三联书店和光华书店出版的《伤痕文学：文革新小说》（*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和纽约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Modern Chinese Fiction*），因此，1979 年可视为海内外英译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年。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英译研究（1979—2010）”（项目编号：15YJC740017）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青年基金“抗战时期北平刊物译介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5WYC068）资助。

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是1979年以来在我国出版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翻译现象。在此之前,以合集形式呈现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的声音在英语世界可谓难觅踪迹,仅有一本美国汉学家王红公(Kenneth Rexroth)在1972年以诗歌创作为主题的《兰舟:中国女诗人选集》(*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叙事类作品合集则完全阙如。自1979年起,中国文学出版社作为当时中国唯一致力于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官方出版社,适时推出了五本女作家作品合集,分别为《当代女作家作品选》(1982)、《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二)》(1991)、《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三)》(1993)、《六位当代中国女作家》(1995)和《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七)》(1998)。

就选材而言,五本合集共收入三十五篇作品,入选女作家包括茹志鹃、黄宗英、宗璞、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方方、残雪、刘索拉、彭小莲、蒋韵、丁晓琦、迟子建、池莉、范小青、程乃珊、苏叶、毕淑敏、阿真、刘西鸿、叶梅、陆星儿、铁凝、张欣、方敏和杨泥共计27人,其中王安忆、方方、毕淑敏、迟子建、范小青、叶梅、张欣有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入选。

尽管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女作家作品合集的目的并非是凸显女性本体意识,而是以反映中国社会现状和国家宏大主题为主旨,但由于创作者的性别身份使然,合集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仍然占据了相当比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女性形象也因此得以展现在英语世界读者面前。中国文学出版社基于自身文化立场所呈现和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为英语世界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新维度。本文试图以形象学和性别视角为切入点,关注“文学译介选材”与“西方读者视野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读者视野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构建”涉及多个层面:从参与构建的载体而言,既包括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译本,也包括在西方传播的影视作品,甚或涉及中国女性形象的西方本土创作,乃至西方媒体涉及中国女性形象报道;从受众接受的角度而言,构建所能取得的效果既取决于传播主体(中/西方的译介者、创作者或传播者)的主观努力,也受制于受众个体及其所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的接受意愿。

由于论题宏大,难以在有限的篇幅中穷究全貌,因此本研究试图聚焦其中一个维度——译介者主体性的角度进行深入讨论。其中,译介者的主体性具体又可体现为宏观选题和微观翻译两个层面,本文选取前者着重探讨,原因在于:在文字处理的微观翻译层面,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译本大致可视为遵循原文的忠实翻译,译本基本实现了原文信息的再现,与此同时也实现了原文中国女性形象的再现。因而,宏观选题就成为了中国女性形象构建的关键。

下文将具体考察上述合集通过宏观选材在中国女性形象构建方面作出的贡

献, 探讨其存在的不足。论文第一部分首先采用形象学视角追溯西方的中国女性形象流变, 然后探究中国文学出版社通过文学作品译介试图呈现的中国女性形象, 进而总结其在对外译介活动中所构建的中国女性形象与西方固有刻板印象 (stereotypes) 相比有何进步; 第二部分运用性别研究的视角揭示其在张扬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的不足之处, 探究其实际构建和试图构建的女性形象之间有何悖论, 进而为未来的对外译介活动提供有益借鉴。

一、形象学视角下中国女性形象呈现之贡献: 类型丰富化

1. 西方中国女性形象之流变

在西方人士的笔下, 中国女性形象往往承载着西方社会以及特定群体对异国“他者”的集体想象, 常常面临被片面言说、简单化构建的命运。略举一例, 尽管时至今日中国早已远离蓄婢纳妾、缠足守节的封建时代, 但“三寸金莲”等词汇在英语世界关于中国的叙事中依然常常出现并成为兴趣焦点。如 1994 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被美国汉学家大卫·威科菲尔 (David Wakefield) 翻译成英文, 引起了广泛关注 (马季, 1994: 102), 如今在亚马逊网站上仍能看到有普通读者称该书“回答了自己关于缠足这一奇特习俗的所有想象” (Marie, 2005)。

西方世界的普通公众对中国女性的种种想象不一而足, 追溯这些想象的源脉络, 不难窥见西方关于中国女性“迷思” (myth) 的构建史。西方世界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呈现可追溯至 1298 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该书忽必烈汗选妃一节中, 马可·波罗首次提到东方女子并对她们的容貌进行了描写, 这些妙龄少女“面貌秀丽”“肤色光洁” (马可·波罗, 1998: 110), 引人遐思, 可视为西方视野中中国女性类型化模式的源头。在之后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 英国的查尔斯·兰姆 (Charles Lamb)、托马斯·胡德 (Thomas Hood) 和柯勒律治 (S. T. Coleridge) 等诸多作家和诗人又据此进行了加工渲染 (Chan, 1989: xxix), 美丽、神秘 (exotic)、精致 (dainty)、温顺的女性形象逐渐固化为英语世界中国女性形象系谱中一个重要的类型。

除了对东方异域进行遥远的跨时空想象, 英语世界作家还根据其与早期华裔的实际接触构建了另一系谱分支, 这些华人女性形象大多镌刻着来自白人视野的偏见和丑化, 其中不乏唐人街妓女和放荡恶毒的女子。事实上, 由于缺乏实际交集, 中国女性形象在早期英语作家的笔下几乎全是剪影式的存在——千篇一律、面目模糊, 缺乏鲜明的独特个性。可以说,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漫长岁

月里,中国女性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存在于西方的想象世界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西交流空前活跃,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华与中国人直接接触,一些华人也得以走出国门,游历西国。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女性逐渐走出英语世界的想象空间,进入他们的实际视野中。一些精通双语、熟谙中西文化者则开始尝试用英语进行创作,将其对中国女性的认知落实到文字中,如西人赛珍珠(Pearl S. Buck)、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项美丽(Emily Hahn)、海伦·斯诺(Helen Snow)、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华人作家韩素音、包柏漪(Bette Bao Lord)、林语堂、张爱玲以及凌叔华等都曾塑造过不同类型的中国女性形象(Chan, 1989: 98)。其中赛珍珠和林语堂二人堪称翘楚,他们的作品走入了西方“寻常百姓家”。

赛珍珠在西方影响最深远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讲述了中国农民王龙一家的兴衰史,展现了20世纪初清朝末年的中国农村生活状态和风土人情,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旧中国农民形象,故事中众多的中国农村女性形象也随之进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其中典型的人物角色包括王龙的妻子阿兰、小妾荷花和三姨太梨花等。

华裔学者陈美美(Chan Mimi,音译)曾这样评价赛珍珠为英语世界的中国女性形象构建所作出的贡献:在赛珍珠创作中国故事之前,西方读者关于“中国佬”的认识除了洗衣工就是黑帮成员,媒体中出现的东方女性则是清一色的性感撩人的“妖精”形象,而《大地》中的阿兰是第一个博得数百万美国和其他西方人认同和怜悯的个体化中国女性角色(Chan, 1989: 98)。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交流初开的时代里,赛珍珠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非凭空臆测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特定女性群体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女性的扭曲印象,打开了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本土女性的大门,其开拓意义不容置疑。

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传播方面,堪与赛珍珠比肩的还有华人作家林语堂。林语堂素喜描摹中国女性,其《京华烟云》有“现代版《红楼梦》”之称,书中人物近百,女性占了多半。与赛珍珠专注于中国底层农村女性不同,林语堂更喜塑造民国时期上流社会大户人家的女性形象。他借由《京华烟云》塑造及向西方展示的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诗意化的中国女性形象。作品的女主人公之一姚木兰就是典型代表,她既是遵从传统妇德的贤妻良母,同时又兼具进步的时代精神,独立自主、睿智豁达,堪称站在男性审美视角设计的兼具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理想女性。《京华烟云》中异彩纷呈的个体女性角色有助于英语世界了解中国女性逐步摆脱封建束缚、迈向新时代的真实状况,对于塑造积极正

面的中国女性形象起到了一定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自赛珍珠和林语堂之后，鲜见有突破性的作品能再度进入西方普通公众的视野，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也长期止步不前。1976年，华裔女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以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席卷美国，登上非小说类（nonfiction）畅销书榜首宝座。在之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故事再度吸引了英语读者的目光。然而，由于这些故事的作者多为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缺少直接体验，对于故事的书写往往堕入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建构中。他们对中国本土女性的叙事非但没有突破，有时反倒退回到落后、愚昧的封建时代，比如《女勇士》中投井自杀的姑姑和谭恩美《喜福会》中的童养媳。这些犹如“文化化石”般的古老桥段向英语世界读者传达的是倒退复古的旧中国女性形象。

就中国女性形象的表述而言，脱节滞后、片面单一的问题并不单单存在于文学领域，在电影等新兴大众传媒领域亦是如此。孙萌（2010）将近百年来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华人女性角色归纳为15种形象类型：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蜘蛛女形象、小妾形象、公主形象、家庭主妇形象、职业女性形象和地母形象。这一系列形象系谱看似丰富，事实上却与文学领域具有类似的困境。由于电影制作者和导演多为英语世界人士，对中国女性的形象塑造几乎无一例外打上了西方文化视角的烙印。影片以中国面孔作为点缀者居多，中国女性多被塑造为满足西方“他者”猎奇或俯视心理的符号化形象，或天使或恶魔，或妖娆或愚昧，导致了女性形象的模糊化、类型化和片面化，鲜有丰满的性格呈现，真实立体的中国女性形象几近阙如。

构建西方公众对中国女性形象认知的另一主要途径是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相比于通俗文学和影视作品，新闻媒体因讲求时效性而更多关注当下中国。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基于自身政治立场所塑造的当代中国女性形象难称客观公允。有学者以近十年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达拉斯晨报》为样本研究了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结果表明，女性受害者的形象占到一半以上，具体涉及弃婴、失学女童、工厂女工、受虐待妇女、下岗女工、过劳女性白领、受压迫的古代女性等（庞琴，2007：47）。这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报道无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女性群体，专注于小众化边缘人群，对不同年龄、地域、职业的中国女性缺乏差异性的洞察视角，亦难逃片面化、类型化中国女性的窠臼。

上述文学、电影和报刊文本类型虽有不同，但却以各自的话语方式“构建

或重复证明”了相似的中国女性形象(孙萌,2010:31)。这些构建无不折射出英语世界单方面作为的局限性。这样的话语交织着对中国历史语境的认知不足和习惯性偏见,彰显出中国基于自身民族文化立场重塑中国女性形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 中国文学出版社中国女性形象之呈现

由于缺乏身临其境的内部语境,西方从外部视角获知的中国女性形象往往与中国当下的现实脱节。中国文学出版社则将视野放在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上,由于合集在选材上乘承现实主义原则,尽量规避了以非理性、主观性和自我表现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这就使得其中的女性角色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和代表性,能够相对真实地呈现当下中国女性的实际面貌。^①

与西方作品中对中国女性的模糊化、片面化呈现不同,中国文学出版社克服了外部视角导致的局限性,全面反映了多样化的新时期中国女性形象。合集中的角色形象饱满,背景各异,涵盖了不同年龄、地域的中国女性。如叶梅的《花树花树》描写的是长江南岸原始村落里的一对土家族双胞胎姐妹,铁凝笔下的孕妇是来自农村的普通农妇,范小青笔下的瑞云是苏州市镇的残疾孤女,《弦上的梦》里的慕容乐珺是艺术学校的大提琴教师,张欣《爱又如何?》的主人公朱可馨是南国都市的白领丽人。合集里既有妙龄少女(如王安忆笔下的妙妙)、中年女性(如《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又有垂暮老人(如《北国一片苍茫》里的母亲)。这些女性形象来自各行各业,展现了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合集呈现了当代不同女性群体的生活境遇,但并非平均着力,作为以对外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官方出版机构,中国文学出版社着意凸显的是时代大潮中的主流人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中国现实社会的中心舞台”,都市文学也逐渐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主流,市民阶层成为其中重要的表现内容(杨绍军,2005:130)。中国文学出版社在选材时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合集对城市女性的呈现远多于农村女性,涉及从小城镇到大都市的普通市民、城市女工、白领阶层、在校学生等诸多职业和身份。这与英语世界集中呈现中国边缘和农村落后女性群体形成了鲜明对照。诚然,边缘女性群体作为客观的存在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但如果一味曝光、过度关注,

^① 本文所列五种合集共收入女作家作品35篇,其中26篇为女性题材,另外9篇为非女性题材,合集收录作品详情请见附录。笔者对全部26篇女性题材作品梳理总结,力求充类至尽。下文以17篇代表性作品为例具体阐释合集建构中国女性形象时的全面多样化特点及其时代局限性。

则难免会以偏概全，在客观上造成对中国女性形象的丑化，让英语读者形成不应有的误解，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努力可以视为对这一行为的纠偏和反拨。

当然，突出主流群体并不意味着对边缘群体的忽视和回避，合集三十五篇作品中仍有六篇以农村女性为表现对象，分别为丁小琦的《马兰花，马兰花》、迟子建的《北国一片苍茫》、苏叶的《痴心》、铁凝的《孕妇和牛》、叶梅《撒忧的龙船河》和《花树花树》。其中一些作品触及了部分地区农村女性面临的痼疾，如《马兰花，马兰花》涉及农村的买卖婚姻，《北国一片苍茫》中的母亲面临家庭暴力，中国文学出版社亦未刻意隐匿。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出版社本着民族本位意识，在选材过程中尽可能展现新时期不同年龄、地域、职业、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中国女性形象，合集作品中的女性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现实社会女性形象的一面镜子，代表着时代变迁中数以亿计的普通中国女性。

二、性别研究视角下中国理想女性形象构建之不足：女性解放与男权传统

1. 中国理想女性形象之构建

如果说中国文学出版社对不同类别女性群体的全面性呈现和对城市女性的倾向性侧重是依据时代变迁作出的自然选择，那么它对于其中一类女性形象则是着意塑造并予以充分肯定的，那就是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形象。无论在合集序跋还是文本选择上，都能体现出中国文学出版社对此类女性的弘扬和宣传。

以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为例，戴乃迭（Gladys Yang）在序言开篇即强调了中国职业女性的现状，她指出，虽然中国女性科学家及作家与男性相比仍然很少，但数量一直在增长；而文集中七位女作家的故事很好地呈现了中国生活的一个侧面（Yang, 1982: 5）。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各自拥有不同的职业，如科学家、教师、医生、作家、舞蹈演员等，这些角色与西方世界固有的中国女性形象不同，她们不再是被压迫的受害者，作为职业女性，她们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劳动，担负社会角色，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杨凤，2007: 166）。合集作品从不同侧面将这些女性塑造为正面的讴歌对象，比如《大雁情》中的植物园科学家秦官属和《人到中年》里的眼科医生陆文婷都属于舍小家顾大家、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典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合集依然秉承了这一倾向，尽管中国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依然是对外弘扬宣传的重点。以张欣《绝非偶然》中的何丽英和《爱又如何？》中的朱

可馨为例,前者是广告公司的策划,后者从出版局辞职后进入杂志社工作,同时兼职专栏作家,她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独立自主,她们能够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这些女性在履行社会职责方面丝毫不逊于男性,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地位的提高,向英语世界呈现了高度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正面的中国女性形象。

中国文学出版社大力推崇独立自主的女性伦理观念,其背后体现的是对建国以来新型妇女观的张扬。新型妇女观认为,妇女的解放归根结底取决于妇女的经济独立,如果妇女得不到就业,经济上就不可能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解放。1949年以来,中国推行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社会变革措施,包括废除包办和买卖婚姻,鼓励、组织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及就业,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地宣传妇女进入各种领域、涉足各种行业,废除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与性别禁令,确保中国妇女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选举权,全面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0;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传教育部,1953)。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刊物刊发题为《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表彰实行男女同酬的第一村——堡子村。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学出版社试图向西方世界展现的就是这种被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了的女性形象。

2. 中国理想女性形象构建之悖论

在试图构建中国理想女性形象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一个悖论是,中国文学出版社对中国理想女性形象的彰显本身存在“吊诡”之处,在选材上或多或少呈现双重价值标准:其选入的一些作品为中国女性实现解放摇旗呐喊,另有一些作品则在赞扬或神化的外衣下无意中宣扬了一系列符合男权价值观和审美观的中国女性形象。

以入选作品《孕妇与牛》为例,小说描写的是一位怀孕的农村年轻女性,她没上过学,一字不识,但因为“长得俊”,嫁进了山外平原上的富裕农家,得到了婆家的厚待。小说以诗意盎然的笔调正面塑造了少妇的美好形象,呈现了她满足适意的生活状态。然而,如果剥离艺术性包装观其本质,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位女性赖以生存的资本可以用文中婆婆的寥寥两句话来概括:“俊的少有”的外貌和怀了孩子的身子。因为长得漂亮,满足了丈夫的审美需求,契合了男性的本能欲望,她得以过上富裕的生活;因为怀了男人的孩子,履行了女人“生育”的职责,她越发“娇贵”,可以“越发任性”地出去走走。这显然

是一个蒙昧于封建伦理体系中的女性形象，“是根据男性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而塑造出来的“女性榜样”（李玲，2005：63）。她不具备“把握自我命运的独立人格”（同上：79），没有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主体意识，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满足男性的本能和欲望。中国文学出版社对这样一个形象的呈现显然无法反映女性生命的真正价值，而是暗含着男性中心的立场。

再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这是新时期最早正面表现爱情题材的作品之一，作品以褒扬的态度讲述了钟雨与“老干部”之间的爱情故事。其中女主人公钟雨的形象设定首先就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约定俗成的审美标准：她外貌清秀，性格温柔娴静，“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张洁，1997：373），读之不禁让人联想到班昭《女诫》中倡导的“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李振林、马凯，2003：34）而谨遵“妇德”的封建社会贤妻形象。就人物角色的身份设定而言，虽然表面看来，小说是由一个离婚女人和一个已婚男人一同演绎的一出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似乎体现了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抗，但实质上，其背后体现的却是中国女性的传统贞节观，两人之间的浪漫故事是以钟雨单方面守节式的奉献为代价的。在故事中，钟雨和老干部一生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他们甚至从未握过手，钟雨将老干部送给她的那套《契诃夫小说集》当作其替身日日相对；尽管她知道老干部有结发妻子，两人结合无望，却终身未嫁；老干部去世后，钟雨臂带黑纱为其悼念；在自己离世之际，她特意嘱咐女儿将《契诃夫小说集》与其一同火葬。钟雨那种对所爱男人的自我牺牲以及对其所赠物品的珍视无不让我们联想起封建社会弘扬的忠贞不二、从一而终的贞节烈女（寿静心，2007：116），因而钟雨从本质上看是一个自觉践行男尊女卑封建观的中国女性形象。

中国文学出版社选入的类似故事不在少数，合集中苏叶的《痴心》以及池莉单行本中的《月儿好》等均属此列。中国文学出版社选入这些作品显然并非意在批判，相反，是要将其中的故事和人物作为正面典型予以宣传，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於可训，1986：38）。《月儿好》的女主人公明月好甘心情愿接受童养媳的命运，被考上大学的丈夫抛弃却没有怨责，后来不幸守寡，却依然自立自强，孤身担负起抚养两个儿子的重任。在英译本序言中，於可训对该角色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样一位“品德端庄、为人正派、处事贤惠”的女性具有“人格上的尊严和品德上的优势”，体现了传统的“东方女性美”（同上：38~39）。

从性别研究的视角而言，上述人物角色虽然在征服外部环境方面表现出了

进取精神和独立品格，认识到了女性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性，但在内心深处却默认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没能真正认同两性平等，未彻底抛弃女性的依附心理。如刘思谦（1993：23）所言，她们都未彻底摆脱男权话语的藩篱，脱离男性中心的文化预设，男性中心立场依然左右着女性的生命价值。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出版社在男权中心问题的认识上或多或少存在盲点，其在倡导女性解放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受到的固有男权传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其解放妇女、尊重女性主体性的初衷，对外呈现了顺应男权审美观的中国女性形象。

从译作在国外的接受角度来看，上述中国女性角色一旦进入孕育女性主义的西方语境，便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素材，受到了审视和批评，部分此类“解放”了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其保守性和局限性则成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焦点。

李木兰（Louise Edwards）和雷金庆（Kam Louie）在《近十年中国小说中的女性》一文中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主题以及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小说中折射出的中国社会仍然高度保守，尽管女性已经可以参与公共劳动，但仍然面临着传统性别观念的种种束缚（Edwards & Louie, 1990：95~112）。与此类似，在《张洁和张辛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文中，罗斯玛丽·A·罗伯茨在详尽阐释了两位作家及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异同后得出结论，虽然两位作家都对固有的性别价值观进行了大尺度挑战，但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没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实现彻底解放（Roberts, 1989：800~813）。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出版社在选材时之所以会流露出上述价值取向，与当时中国社会种种因素的复杂交织不无关系。一方面，就文学创作思潮而言，当时存在相当数量以艺术化、诗意化视角赞扬刻画此类中国女性形象的作品；另一方面，就社会文化思潮而言，尽管女性主义已被引入中国，^②但仍局限在相对专业化的学术圈内，受制于民间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转型期特有的社会心理状态等多重因素，女性意识的彻底觉醒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未得到广泛认同。^③笔者之所以进行上述举例和论证，并非是对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行为求全责备，更不是

^②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女性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部分专业学者开始借用女性主义的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女性自身的解放和发展问题，认识到了造成两性不平等的原因主要在于男权统治以及各种支配模式和观念形成的文化积弊（刘思谦，1993；刘慧英，1996）。

^③ 《中国文学》编辑部亦不能例外。据笔者于2011年5月20日对中国文学出版社中文部编审徐慎贵的访谈得知，选定翻译文本的具体流程如下：中国文学出版社在机构设置上分为中文编辑部和外文翻译部，中文编辑部的中文编审负责选择合适的中文稿件，提供待译作品，选定的作品经编辑部主任二审后送总编审核，最终决定适合翻译出版的作品。中文部所选的素材主要来自

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一味追求对传统的反叛，放弃展现中国女性的优点和美德，而是欲以性别意识为切入点，彰显男权中心传统的隐蔽性和强大性，为对外译介行为阐释提供一种反思的视角。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对外呈现中国女性形象时在选材方面的利弊得失。从形象建构的视角而言，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主要贡献在于：本着民族本位意识，尽可能以文学的形式全方位、多侧面展现新时期的中国女性形象，对当下时代女性的特别关注为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增添了新的现实维度；对不同背景女性、尤其是城市普通女性的侧重极大地弥补了西方塑造的片面化、类型化的中国女性形象的缺陷，有助于纠正英语世界对中国女性笼统而模糊的认知。

作为对外代表国家的官方机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性别话语有别于其他个人及学术译介主体，其坚守社会主义主流妇女观，按照国家、民族叙事的需要重点推介合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理想女性，力图呈现实现解放、走向社会、独立自主的积极正面的中国女性形象。

从性别视角而言，其不足在于：中国社会男权思想的积习依然存在，社会主义主流妇女观对于性别差异的认知有待深入，以全面倡导女性主体意识为宗旨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仍未走出小众的精英学界领域，因而中国文学出版社对中国理想女性的形象构建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双重价值标准——合集力图张扬实现了解放的中国女性形象，遗憾的是部分作品所呈现的女性形象无意间迎合了男权价值标准和审美观，这或多或少疏离了中国文学出版社解放女性、尊重女性主体性的初衷，在西方读者中引发了观念的碰撞。

总体而言，作为国家喉舌的官方立场决定了中国文学出版社不可能罔顾国家和民族形象塑造的核心诉求，在对外呈现中国女性形象时做到面面俱到，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它相对客观真实地呈现了传统和现代价值观交织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为刷新英语世界的固有中国女性形象作出了贡献。

最后需要指出，上述五种合集进入英语世界后，相关评论文章较少，这在

于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十月》《收获》《花城》和《当代》等，选刊类期刊如《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也是重要的渠道。虽然编辑部也会邀请如李子云、吴宗蕙、盛英等文学评论家作序，但都是在中文文本选定之后。换言之，以专业文学批评家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并不直接参与作品的遴选。因此，在选材过程中，女性主义理念以及在中国产生的新成果不易得到反映，出版社对于部分入选作品中女性形象囿于父权制文化逻辑的问题不易省察。

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在英语世界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究其原因,相关译介行为出现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发端阶段,面对相对陌生的异质文化,沟通交流经验仍有待完善。尽管如此,作为主动的文化输出方,中国文学出版社筚路蓝缕,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应当借鉴过往,把握好民族立场,同时加深对他国的认知,省察自身盲点,知己知彼,力求弘扬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异域所认可的文化价值观,以利于在对外传播中积极有效地建构自我国民、文化乃至国家形象。

(致谢:本文在成文修改过程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老师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感谢!)

参考文献:

- [1] Chan M. *Through Western Eye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M]. Hong Kong, China: Joint Publishing, 1989.
- [2] Chi L, Fang X, Cheng N, Su Y, Bi S, An Z & Liu X.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III* [C]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93.
- [3] Edwards L & Louie K. Women in Chinese fiction: The last ten years [J].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1990, 5 (11): 95~112.
- [4] Fang F, Can X, Liu S, Peng X, Jiang Y, Ding X & Chi Z.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II* [C]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91.
- [5] Lu X & Liu X.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 [C]. Hong Kong, China: Joint Publishing, 1979.
- [6] Marie H. The way of change leads to people's suffering (customer review) [EB/OL]. https://www.amazon.com/gp/customer-reviews/RS4V6L6H8EEQX/ref=cm_cr_getr_d_rvw_ttl?ie=UTF8&ASIN=0824816064, 2005-9-24/2019-11-01.
- [7] Rexroth K.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 [C]. New York: McGraw-Hill, 1972.
- [8] Roberts R A. Images of women in the fiction of Zhang Jie and Zhang Xinxin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89, 120: 800~813.
- [9] Ru Z, Huang Z, Zong P, Shen R, Zhang J, Zhang K & Wang A.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C].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 [10] Yang G. Preface [C] //Yang G.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5~9.
- [11] Yang L & Mao K.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C]. New York: Paragon Book Gallery, 1979.
- [12] Ye M, Lu X, Fan X, Tie N, Wang A & Zhang X. *Six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 Writers IV* [C]. Beijing : Chinese Literature, 1995.
- [13] Ye M, Chi Z, Fang F, Bi S, Fang X, Fang M, Yang N & Zhang X.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VII* [C]. Beijing : Chinese Literature, 1998.
- [14] 李华. 合作社内应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J]. 《妇女工作》(贵州), 1955 (10): 26.
- [15] 李玲. 想象女性: 男权视角下的女性人物及其命运 [C]// 傅光明. 女性的心灵地图.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 63.
- [16] 李振林, 马凯. 中国古代女子全书——女儿规 [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
- [17] 刘慧英.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18] 刘思谦.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 [19] 马季. 《三寸金莲》在美国 [J]. 文学自由谈, 1994 (3): 102.
- [20]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 [M]. 梁生智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 [21] 庞琴. 美国主要报纸中的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分析 [J]. 南方论刊, 2007 (11): 47~49.
- [22] 寿静心. 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47 (3): 115~120.
- [23] 孙萌. “她者”镜像: 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24] 杨凤. 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25] 杨绍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都市文学研究综述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5 (5): 130~133.
- [26] 於可训. 池莉的创作及其文化特色 [J]. 小说评论, 1986 (4): 36~40.
- [27] 张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勇气吗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 [28]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城市妇女参加生产的经验 [M]. 北京: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0.
- [29]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传部. 妇女参加生产建设的先进榜样 [M]. 北京: 青年出版社, 1953.

收稿日期: 2017-12-11

作者信息: 付文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0029, 研究方向: 翻译与跨文化比较。
电子邮箱: fuwenhui@vip.sina.com

附录：1979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及作品列表

合集名称	作家	作品	题材 (是否有女性主人公)
当代女作家作品选 (1985年)	茹志娟	<i>The Path through the Grassland</i>	否
	黄宗英	<i>The Fight of the Wild Geese</i>	是
	宗璞	<i>Melody in Dreams</i>	是
	湛容	<i>At Middle Age</i>	是
	张洁	<i>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i>	是
	张抗抗	<i>The Wasted Years</i>	是
	王安忆	<i>Life in a Small Courtyard</i>	是
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 (之二)(1991)	方方	<i>Landscape</i>	否
	残雪	<i>Dialogue in Heaven</i>	否
	刘索拉	<i>Blue Sky and Green Sea</i>	是
	彭小莲	<i>Hopes Worn Away</i>	是
	蒋韵	<i>Crucible</i>	是
	丁小琦	<i>Purple Asters</i>	是
	迟子建	<i>In the Vast Country of the North</i>	是
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 (之三)(1993)	池莉	<i>Trials and Tribulations</i>	否
	范小青	<i>Ruiyun</i>	是
	程乃珊	<i>Happy Birthday</i>	是
	苏叶	<i>Scatterbrain</i>	是
	毕淑敏	<i>Broken Transformers</i>	否
	阿真	<i>I Love You, Child</i>	否
	刘西鸿	<i>Black Forest</i>	是
六位当代中国女作家 (1995)	叶梅	<i>Rhapsody of the Wake Dancers</i>	是
	陆星儿	<i>Under One Roof</i>	是
	范小青	<i>Return to Secular Life</i>	是
	铁凝	<i>The Pregnant Woman and the Cow</i>	是
	王安忆	<i>Miaomiao</i>	是
	张欣	<i>Certainly Not Coincidence</i>	是
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 (之七)(1998)	叶梅	<i>Two Trees, Twinned Fates</i>	是
	迟子建	<i>Beloved Potatoes</i>	是
	方方	<i>Stakeout</i>	否
	毕淑敏	<i>An Appointment With Death</i>	否
	范小青	<i>Hand in Hand</i>	是
	方敏	<i>The Endangered Ones</i>	否
	杨妮	<i>Hong Ling</i>	是
	张欣	<i>If Love, Then What?</i>	是

Text Selec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s of Chinese Women—A Study of the Antholog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men Writers by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after 1979

Fu Wenhu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CLP) was a government-sponsored project to translate texts by Chinese writ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lection criteria used by the CLP in translating texts by Chinese female writers after 1979. It highlights the project's efforts in promoting a desired imag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an and contributions of presenting a variety of images to the Anglophone world. It also discusse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ideal image that the project intended to promote and what was more likely conveyed. From an imagolog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the anthologies convey greater diversity in Chinese women than do Western stereotypes and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how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deal Chinese women diverges from that expected. Manifold and close-to-life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particular of working and of urban women, were illustrated as the CLP aimed to demonstrate the positive transition of women's status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adoxically, some female figures in the anthologies still have a subordinating mentality in spite of their economic independence, reflecting the CLP's ignorance within a male-centric ideology to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psychological freedom.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literary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discusses ongoing concerns particular to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antholog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text selection; women writer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